

冲突话语研究综述

贾雯晰 贺琳

西安外国语大学英文学院

DOI:10.32629/er.v9i5.7093

[摘要] 本文通过对国内外冲突话语研究现状的系统梳理，旨在明确该领域的学术进展与核心主题，为促进人际和谐交往提供参考。研究回顾了冲突话语的定义演变、结构特征及多维语用视角。研究发现，冲突话语研究已由单一会话分析转向涵盖不礼貌理论、语用顺应、人际关系管理及语用理性的多维范式；其结构细化为起始、延续与终结三个动态博弈阶段；研究对象则从亲子、夫妻等私人语境扩展至医疗、政论及网络社交等公共语境。结论指出，尽管该领域理论整合成果显著，但仍面临界定标准模糊、研究方法局限及语料规模有限等挑战。未来研究应致力于厘清结构标准，利用大规模量化分析扩展语料体量，并整合非语言符号等多元视角，以推动研究体系的整体完善。

[关键词] 冲突话语；语用学；互动序列；不礼貌理论；人际关系管理

中图分类号：H030 文献标识码：A

A Review of Conflict Talk Research

Wenxi Jia, Lin He

School of English Studies, Xi'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reviews global research on conflict talk to clarify its academic evolution and core themes. It examines the definitional shifts,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and pragmatic frameworks of the field. Findings show that the research paradigm has evolved from conversation analysis to a multidimensional approach involving impoliteness, adaptation, rapport management, and pragmatic rationality. The interactional structure is categorized into three dynamic stages: inception, continuation, and termination, while the scope has broadened from private domains to public sectors like medical and online discourse. Despite theoretical progress, issues like inconsistent standards and limited data persist. Future directions should focus on standardized structural analysis, large-scale quantitative data, and the inclusion of non-verbal cues to refine the research framework.

Keywords: Conflict Talk; Pragmatics; Interactional Sequence; Impoliteness Theory; Rapport Management

引言

冲突普遍存在于人际交往中^[1]，并非局限于某个特定场景的偶然现象。冲突话语 (conflict talk) 不仅是社会生活中最核心、最复杂的互动形式之一，更是构建交际者立场，反映其交际目的的动态过程^[2]。长期以来，冲突话语常被视作一种负面的、破坏性的言语行为。然而，随着语用学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发现冲突话语表现出不同的作用：既可能破坏人际和谐，也具有重构人际关系、促进社会化进程的积极潜力^[1, 3]。尤其在当今跨文化交际与社交媒体语境下，冲突话语的表现形式更趋隐蔽与复杂^[4]，因此，系统梳理冲突话语的研究脉络，对深化人际理解、促进和谐交往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本文旨在对国内外冲突话语的研究现状，从理论发展、研究方法与核心主题进行系统梳理与评述，以明确该领域的学术进展，并对未来研究方向提出展望。

1 冲突话语的定义

学者们对于冲突话语有着不同的术语定义，Grimshaw^[2]将这种互动现象统称为“conflict talk”；Eisenberg 和 Garvey^[5]将其描述为“adversative episode”；Pomerantz^[6]侧重于行为描述，称其为“disagreement”；Brenneij^[7]将其界定为“dispute”；而 Antaki^[8]则使用了更具生活化的术语“quarrel”。也有国内学者定义其为“冲突话语”^[9]；“会话冲突”^[10]；“冲突性话语”^[11]等。这些术语的差异主要源于学者们研究视角的不同：有的侧重于结构序列 (如 episode)，有的侧重于语用行为 (如 disagreement)，有的则关注其社会对立性 (如 conflict)。尽管学者倾向选择不同的术语描述这一对话现象，这些术语的核心含义均指向交际者之间表达不一致的认识、立场、观点，具有“趋异性”的言语互动过程^[1]。

2 冲突话语的结构研究

冲突话语研究的难点在于会话序列之间界限是模糊的^[11]，但为了方便研究和分析，学者们将冲突话语的结构大致分为三部分：起始，延续，以及终结。该分类对于冲突话语的研究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下面是对这三个部分的详细回顾。

冲突话语的开启是由第一说话人进行陈述 (statement)，然后是第二说话人的反对 (opposition)，最后第一说话人针对这个反对进行“反反对” (counter-opposition)^[12]。但对于第一说话人的陈述是否引起冲突需要后续话语辅助界定，比如，再永平^[13]认为冲突性话语的引发是双向的，并具有很强的对撞性。也就是说，如果出现了听话人的回避、接受、缓和性回应等，说话人的话语就不是冲突引发语，因为没有引起冲突性会话。赵英玲^[9]根据汉语冲突话语进行分析总结出三种模式的起始话步：表态性陈述 \leftrightarrow 否定性表态；指令 \leftrightarrow 拒绝；煽动性发问 \leftrightarrow 对抗性应答。

冲突的延续阶段不仅是交际双方语言层面的较量，更是双方在“和谐—挑战取向”上进行的动态身份博弈^[14]。该阶段具有明显的“趋异取向”，即交际者会为了凸显立场分歧而有意地选择挑战性的言语行为^[13]。赵英玲^[9]提出五种具体的冲突话步类型来解构冲突话语的延续阶段：争论式（直接表达对立观点）；非顺从式（拒绝接受对方请求或指令）；返回对方话步（将对方的攻击点反弹回去）；回收再用式（重复利用对方的话语进行反击）；替换纠正式（通过纠正对方的信息来削弱其立场）。这些话步是冲突话语的组成单元。Honda^[15]通过研究日本公共事务脱口秀中的冲突对话发现：补救行为（面子维护行为）是冲突结构中的一部分，而非随机发生的。这也说明冲突对话中的双方并非一直处于绝对的对立状态，而是平衡在流动的缓和与对立中。

冲突话语的结束并非简单的言语中止，而是涉及序列闭合、角色对齐及关系再协商的动态过程^[3, 16]。早期研究以Vuchinich^[12]为代表，总结出投降、妥协、僵局中的话题转换、第三方打断及撤退等终结模式。随后的研究转向语用动机，Honda^[15]强调了面子工作在抵消冲突威胁中的缓冲作用，认为双方力量博弈决定了和解或僵局的走向。再永平^[11]进一步将其划分为“强势语”与“缓和语”两种权衡模式。当视角扩展至多方互动，Nguyen^[11]指出终结依赖于第三方的“对齐” (alignment) 介入及事后的身份协商。在中国调停语境下，Ran^[6]的“情面威胁调节模型 (QTR)”认为对话双方会通过构建互惠情感面子促成和解。

3 冲突话语研究的理论基础

冲突话语作为一个典型的语用与互动范畴，其研究范式已历经了显著的演变。从最初侧重于会话分析视角，逐渐拓展至涵盖认知、身份及人际关系管理的多维研究视角。目前，

学术界主要从礼貌理论、语用顺应论、人际关系管理理论，和语用理性理论分析冲突话语的形成机制和语用功能。

不礼貌理论是分析冲突话语最直观且核心的视角之一。与传统礼貌研究关注社会和谐不同，不礼貌视角的研究聚焦于交际者如何通过言语行为蓄意攻击对方的面子，从而引发或加剧冲突。Culpeper^[18-19]作为不礼貌理论的奠基者，提出了不礼貌的五种基本策略，包括积极不礼貌 (positive impoliteness)、消极不礼貌 (negative impoliteness) 等，并指出其核心在于对面子的攻击。Bousfield^[17]进一步完善了该理论，将其从静态的策略分类扩展到动态的互动序列中，强调了不礼貌行为在冲突话语中的连贯性与回应模式。

基于以上的不礼貌理论，许多学者在此视角下对不同语境的冲突话语展开研究。在家庭交际语境下，刘晓艺^[20]通过对亲子冲突的分析发现，冲突主体经常使用“寻求分歧”“挑战他人”以及“明确将对方与消极方面联系起来”等不礼貌策略。研究指出，亲子冲突往往具有明显的意向性。Lang et al^[21]在对家庭剧《养育者》 (Breeders) 的研究中，利用Bousfield^[17]的理论模型，归纳了家庭成员在冲突中的不礼貌产出模式及听话人的回应模式，认为不礼貌言语是家庭矛盾最直接的催化剂。在机构性会话语境中，不礼貌策略的运用则更具战略性。葛欣然与刘风光^[22]针对英国政治访谈节目的研究表明，冲突话语常表现为批评、蔑视或嘲讽等策略。他们发现，在政治访谈中，不礼貌不仅是一种情感宣泄，更是一种语用功能，旨在通过损害受访者的公众形象来揭示事实或维护媒体的监督权。综上所述，不礼貌视角下的冲突研究已从简单的策略识别，演进为对不同社会语境下权势博弈、身份建构及互动功能的深度剖析。

一些学者也采用语用顺应论视角分析冲突话语。基于Verschueren^[23]的顺应论，冲突话语被视为交际者在高度动态的语境下，为了实现特定交际目的而进行的语言选择。赖小玉^[24]研究发现，冲突参与者会不断顺应物理、社交及心理世界的各种要素，通过调整语用策略来释放负面情绪或争夺话语支配权。这种视角强调了冲突话语在本质上是语言选择与语境因素不断适配的过程。

从人际关系管理理论 (Rapport Management Theory) 来看，冲突话语的终结不仅是言语对立的解决，更是交际者对人际和谐进行的动态修复与重构。Spencer-Oatey^[25]指出，人际关系管理核心涉及面子管理和社交权利管理。在冲突终结阶段，交际者往往会根据语用动机调整策略，以平衡立场的对立与关系的维护。此外，胡春雨与范琳琳^[26]强调，权势关系在冲突策略的选择中起着调节作用；在商务语境下，交际者会根据对手的权势等级动态调整终结模式，通过折中或顺应策略来实现社交权利的再平衡与职业形象的维护。具体而

言，冲突的终结模式深受面子补偿机制的影响。当交际者意识到冲突可能导致关系彻底破裂时，会倾向于利用“缓和语”来抵消威胁，从而在保全社交面子的前提下达成和解^[27]。例如在医患冲突或公共场合冲突中，冲突的平息往往依赖于一方对另一方社交权利准则的重新遵循与认可^[28]。

语用理性视角强调了研究应聚焦于交际者的选择。张结根^[3, 29]指出，传统的冲突话语研究往往聚焦于语言形式与交际策略，却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交际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基于此，他提出了语用理性视角，认为冲突话语不仅是由于违反交际准则产生的负面现象，更是交际主体基于目的理性与价值理性进行主动选择的结果。这一观点为冲突话语的研究开辟了新的研究方向。

4 冲突话语的研究主题与对象

在对冲突话语研究的梳理过程中，本研究发现该领域研究主要聚焦冲突话语的语言特征、冲突话语成因与诱因，与冲突话语应对策略。研究对象主要涵盖了日常与私人生活语境、机构与公共语境，与网络社交语境。

首先，冲突话语的语言特征研究在微观层面呈现出高度结构化与对抗性的特征。除了前文提到的冲突话语的启始、延续和结束，The Goodwins^[30]提出的“间隙性争论”(interstitial argument)，指出交际者善于利用对方话语提供的结构框架进行立场转化。其次，冲突话语的特征还体现在非言语符号及沉默的策略性使用上。Tannen^[31]在探讨文学与现实交际中的冲突时发现，沉默和停顿同样是具有研究价值的语言特征，因为停顿往往标志着冲突能量的积累，而沉默则可能出现在冲突最激烈的对峙时刻，作为一种消极抵抗或冲突管理的手段。

从话语的自我管理功能来看，刘平^[10]指出会话冲突具有显著的元语用特征。在冲突语境下，参与者频繁使用特定的人称代词、话语标记语以及对他人话语的元语用评价。这体现了交际者对交际信息和过程进行自我管理与调节的意识。刘平^[10]表明，这些元语用特征本质上是在搭建互动框架，旨在通过对言语行为本身的监控来加强自我立场的坚持或对他人观点的攻击，从而导致对抗性的升级。

冲突话语成因与诱因的研究发现其产生受到社会、认知及文化等多重因素的制约。Grimshaw^[2]强调了权力关系在冲突定义中的核心地位，指出权势不对等往往是机构语境下对抗爆发的制度性诱因。在认知层面，Mehan^[32]认为参与者认知模式的不一致导致了交际框架的断裂。Zhu Hua^[29]通过对移民家庭代际冲突的考察发现，深层文化价值观的对立，如传统孝道与西方个人主义的碰撞，是诱发话语对抗的根本动因。冲突本质上是交际者在不同文化身份间的权衡与博弈。

针对冲突话语回应策略的研究发现权势关系是制约策

略选择的核心变量^[33]，交际者会根据权势等级在顺应、对立及折中策略间动态迁移。在具体话步中，杨骁勇^[4]强调了冲突话步的调节功能，认为通过道歉、解释等缓和性回应策略可有效抵消面子威胁。随着对抗性的升级，回应者往往通过直接反驳、挑战甚至蔑视来回应不礼貌攻击^[17]。Kádár^[34]强调回应策略的评价性特征，指出回应不仅是言语的交锋，更是对对方社会行为是否合乎规范的道德评价，这种评价直接决定了回应是走向调解还是激化。

冲突话语的研究涵盖了日常与私人生活语境，机构与公共语境，也包括网络社交语境。日常生活语境研究主要聚焦于亲密关系中的权力平衡与文化承袭。常见的亲密关系包括亲子，同伴，夫妻等。Zhu Hua^[33]考察了华裔移民家庭的代际对抗，指出这种冲突不仅是语码转换，更是传统孝道与现代个人主义价值观的深度对抗。赖小玉^[24]研究了夫妻间的冲突性话语，解释了交际者如何通过语言选择来适应心理世界和社交世界，从而达到宣泄负面情绪、重塑家庭权势等目的。此外，Goodwins^[30]记录了同伴间的戏谑性冲突，将其阐释为一种社交化训练，即通过对抗性互动来强化群体内的身份认同。

机构语境的研究侧重于在职业身份和制度框架下冲突的规约化特征。Nguyen^[11]分析了药师与病人的多方会话，解释了专业知识不对等如何导致建议协商过程中的言语拉锯。Honda^[15]研究了日本电视政论节目，指出冲突的激化受限于节目本身的参与结构，参与者必须在对抗与公众形象维护之间寻找平衡。Li, Liu & Liu^[36]剖析了职场剧中的性别权力博弈，阐明了高职位者如何利用话语控制权施压，以及女性在对抗中如何应对性别刻板印象带来的双重压力。在法庭与商务谈判领域，研究者则将冲突视为实现程序公正或达成经济利益的策略性工具。可以看出，说话者受限于自己的公共形象，或为了遵循某些领域的规约，其对冲突话语的呈现与解决方式大不相同。

网络的普及使冲突话语的研究语料从即时延伸至非即时。学者们开始试图从网络上寻找有研究价值的语料。例如，Blitvich^[37]收集了CNN论坛中关于拉丁裔身份讨论的在线评论，分析了全球化背景下的跨国身份构建。这种基于网络论坛的研究解释了匿名性与开放性如何使冲突从个人恩怨转化为复杂的身份认同。

5 总结

本文系统梳理了国内外冲突话语研究的现状，包括研究在视角、议题与对象上呈现多元化的态势。尽管该领域已取得一定进展，且学术界对冲突话语研究重要性的认知日益深化，整体上仍有较大的拓展空间。首先，冲突话语结构的界定标准不一，这一概念层面的模糊性可能削弱后续研究的客观性与可重复性。其次，研究方法较为单一，大部分研究为

质性范式, 仅聚焦于特定语境下的冲突片段, 语料规模有限, 致使结论往往难以超越其语料背景, 缺乏充分的量化数据支撑。

既有研究的不足恰为未来探索提供了方向。第一, 需进一步厘清冲突话语的结构特征, 明确语料界定范围。建议采取自下而上的方法系统地收集冲突话语语料, 在此基础上归纳出跨语境适用的结构类型, 为后续分析提供稳固的操作基础。第二, 扩展冲突话语语料种类与体量, 通过大规模冲突片段的量化分析, 对引发语, 缓和语等标记语进行系统标注和统计。语料来源亦可多元化, 不只局限于影视作品中冲突的片段, 增加对实时(例如现实对话)和延时语料(例如网络社交)中冲突话语的收集。第三, 持续完善研究理论和分析视角, 不仅局限于语言行为的冲突, 也放眼于非语言行为的冲突。

此外, 相比于国外研究纵向的理论探究, 如深入探究冲突话语诱因, 与身份认同, 和情绪反应等维度进行深层联系; 现今国内研究更多发展横向的研究, 多围绕多元理论对冲突现象进行整合式阐释。因此, 未来研究宜在保持理论视角多样性的前提下, 加强对纵向议题的开发, 以推动冲突话语研究体系的整体完善。

[参考文献]

[1]冉永平.冲突性话语的语用学研究概述[J].外语教学,2010,31(1):1-6.

[2]Grimshaw A. D. Conflict Talk: Sociolinguistic Investigations of Arguments in Conversations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3]张结根.冲突话语研究四十年[J].集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23(2):123-128.

[4]杨晓勇.人际冲突性话语的语用分析与缓和策略[J].外语教学,2013,34(2):39-43.

[5]Eisenberg, A.R. and Garvey, C. (1981) Children's use of adversative episodes. *Socioemotional Development*, 1, 149-177.

[6]Pomerantz, A. (1984) Agreeing and disagreeing with assessments: some features of preferred/dispreferred turn shapes. J. M. Atkinson and J. Heritage, Eds., *Structures of Social Action: Studies in Conversation Analysi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57-101.

[7]Brenneis, D. (1988) Language and Disputing.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17, 221-237.

[8]Antaki, C. (1994) *Explaining and Arguing: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Accounts*. Sage, London.

[9]赵英玲.冲突话语分析[J].外语学刊,2004(5):37-42.

[10]刘平.会话冲突中元语用话语的语言表征及语用功

能分析[J].外语教学,2010,31(6):24-28.

[11]Nguyen, H.T. (2011) Boundary and alignment in multiparty conflict talk. *Journal of Pragmatics*, 43, 1755-1771.

[12]Vuchinich, S. (1987) Starting and stopping spontaneous family conflicts.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49, 591-601.

[13]冉永平.冲突性话语趋异取向的语用分析[J].现代外语,2010,33(2):150-157.

[14]冉永平,杨巍.冲突话语的顺应性分析[J].现代外语,2011,34(4):362-369.

[15]Honda, A. (2002) Conflict management in Japanese public affairs talk shows. *Journal of Pragmatics*, 34, 573-608.

[16]Ran, Y. and Zhao, L. (2018) Building mutual affection-based face in conflict mediation: A Chinese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model. *Journal of Pragmatics*, 129, 185-198.

[17]Bousfield, D. (2008) *Impoliteness in Interaction*. John Benjamins, Amsterdam.

[18]Culpeper, J. (1996) Towards an anatomy of impoliteness. *Journal of Pragmatics*, 25, 349-367.

[19]Culpeper, J. (2011) *Impoliteness: Using Language to Cause Offen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20]刘晓艺.亲子冲突话语中的不礼貌语用策略研究[J].海外英语,2020(18):102-103.

[21]Lang, Y., Wang, K. and Zhang, L. (2024) A study of conflict talk among family members in Breeders based on the impoliteness theory. *Journal of Educatio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7.

[22]葛欣然,刘风光.不礼貌理论视域下英国政治访谈中冲突性话语研究[J].外语研究,2023(8):70-75.

[23]Verschuere, J. (1999) *Understanding pragmatics*. Edward Arnold, London.

[24]赖小玉.汉语语境下夫妻间冲突性话语的顺应性研究[J].外语学刊,2011(4):59-63.

[25]Spencer-Oatey, H. (2008) *Culturally speaking: Culture, communication and politeness theory*. 2nd Edition, Continuum, London.

[26]胡春雨,范琳琳.商务交际中的冲突性话语研究——以电影《乔布斯》为例[J].外语教学,2016,37(2):12-16.

[27]郭世宸.人际关系管理理论视角下公共场合冲突性话语研究[J].文化创新比较研究,2022,6(10):38-41.

[28]李心蕊.人际关系管理视角下医患冲突话语研究——以医疗纪录片《人间世》为例[J].海外英语,2022(5):41-43.

[29]张结根.语用理性视角下的冲突话语研究[D].南京:南京大学,2019.

[30]Goodwin, C. and Goodwin, M.H. (1990) Interstitial argument. A.D. Grimshaw, Ed., *Conflict Talk: Sociolinguistic Investigations of Arguments in Conversatio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85-117.

[31]Tannen, D. (1990) Silence as conflict management in fiction and drama. A.D. Grimshaw, Ed., *Conflict Talk: Sociolinguistic Investigations of Arguments in Conversatio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260-279.

[32]Mehan, H. (1990) Oracular reasoning in a psychiatric exam: The resolution of conflict in language. A.D. Grimshaw, Ed., *Conflict Talk: Sociolinguistic Investigations of Arguments in Conversatio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160-177.

[33]Zhu, H. (2008) Duelling languages, duelling values: Codeswitching in bilingual intergenerational conflict talk in diasporic families. *Journal of Pragmatics*, 40, 1799-1816.

[34]龚双萍.冲突性话语回应策略与权势的语用分析[J].外语学刊,2011(5):76-81.

[35]Kádár, D.Z. (2019) Introduction: Advancing linguistic politeness theory by using Chinese data. *Acta Linguistica Academica*, 66, 149-164.

[36]Li, H., Liu, H. and Liu, D. (2022) Gender/power relationships in fictional conflict talk at the workplace: Analyzing television dramatic dialogue in *The Newsroom*. *Journal of Pragmatics*, 187, 58-71.

[37]Garcés-Conejos Blitvich, P. (2018) Globalization, transnational identities, and conflict talk: The superdiversity and complexity of the Latino identity. *Journal of Pragmatics*, 134, 120-133.

作者简介:

贾雯晰(2003.07-),女,汉族,辽宁抚顺人,西安外国语大学英文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应用语言学。

基金项目:

陕西高校青年创新团队建设项目“智融话语与认知传播研究创新团队”的阶段性成果(陕教函[2026]30号)。